

漢之珍 主編

中國歷代語言學家評傳

復旦

出版社

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

濮之珍 主 编
高天如 副主编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202号

责任编辑 杜荣根

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

濮之珍 主编

高天如 副主编

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国权路 579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5 字数388,000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ISBN7-309-00571-6/H·67

定价：8.10元

目 录

- (1) 前 言 漢之珍
(13) 苟 况 漢之珍
(22) 史 游 漢之珍
(29) 扬 雄 漱之珍
(40) 许 慎 祝敏申
(66) 刘 熙 孟 进
(75) 张 握 漱之珍
(82) 李 登 吴礼权
(89) 孙 炎 吴礼权
(96) 郭 璞 沈榕秋
(106) 江 式 孟 进
(111) 顾野王 杨剑桥
(120) 颜之推 杨剑桥
(131) 陆德明 潘悟云
(137) 陆法言 潘悟云
(144) 颜师古 孙锡信
(155) 守 温 杨剑桥
(163) 刘知己 赵蒙良
(171) 徐铉 徐锴 沈榕秋
(180) 郭忠恕 叶保民
(186) 陈彭年 黄志强
(193) 吴 梗 李恕豪
(202) 陈 骥 吴礼权

- (212) 王 构 吴礼权
(218) 周德清 沈榕秋
(230) 陈 第 李恕豪
(242) 顾炎武 李恕豪
(256) 潘 未 孟 进
(267) 江 永 钟敬华
(274) 戴 麟 钟敬华
(280) 钱大昕 沈榕秋
(289) 段玉裁 钟敬华
(302) 桂 蕤 林之丰
(312) 王念孙 赵蒙良
(321) 钱大昭 吴礼权
(327) 孔广森 沈榕秋
(334) 郝懿行 漢之珍
(340) 王引之 吕素勤 吴礼权
(350) 江有诰 漢之珍
(356) 王 篓 吴礼权
(366) 朱骏声 喻耀华 顾妙兰
(376) 陈 灌 杨剑桥
(388) 俞 槐 袁国霏
(397) 吴大澂 祝敏申
(412) 马建忠 高天如
(422) 孙诒让 伍雅清
(431) 王鑒章 高天如
(439) 王 照 温国才
(447) 章炳麟 高天如
(459) 王国维 伍雅清
(468) 刘师培 袁国霏

前　　言

濮之珍

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，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文化巨人，仅就语言学家而言，早在世纪初，即我国汉代，便出现了堪称世界语言学大师的扬雄和许慎。从此以后，各个历史时期，不断出现优秀的语言学家。他们的学术著作，是构成中华民族多采多姿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任务中，继承并发扬古代语言学家的优良传统，以为今天的借鉴，并借此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，都是非常必要的。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部《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》。在书中，我们评介了自先秦至“五四”时期的51位主要语言学家，基本上反映了两千年来我国古代语言学家的活动概貌。我们采用以传为主、寓评于传、评传结合的体例。对每位语言学家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著作，都努力收集资料，争取有较为详细的述评。

中国语言学研究，历史悠久，遗产丰富。它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，也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。不过，自古以来，对语言学家是重视不够的。例如，历代史书中的《儒林传》，就很少有语言学家的传记。《汉书》中有《扬雄传》，《后汉书》中有《许慎传》，

那是因为扬雄是辞赋家、许慎是经学家的缘故。而有些贡献很大的语言学家，史书上无传，如写第一本韵书《切韵》的陆法言，写《中原音韵》的周德清，首创三十字母的守温等，在语言学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应该为他们立传，以弘扬他们在语言学上的贡献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不少语言学家的生平资料非常缺乏，这给我们撰写《评传》带来了相当的困难。如陆法言，史书无传，其他资料又少，要写好他的评传绝非易事，但作者迎难而上，爬梳整理，辑录了不少资料，基本上搞清了他的家世：“陆法言的祖先出自代北鲜卑族，世为部落长，号步陆孤氏。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，实行汉化，才随之改作陆姓。先祖陆俟在魏功勋卓著，拜为征西大将军东平王。俟生子骐𬴊、骐𬴊生子孟远、孟远子粲之，粲之子爽，爽即陆法言的父亲。陆爽小时候，即聪敏过人，九岁就学，日诵千余言。十七岁召为北齐清河王的主簿。周灭齐，周武帝闻其名，征陆爽等十余人入关。其他人载了许多财产前去，只有陆爽载书数千卷。隋高祖受禅以后，封他为太子内直监、太子洗马。在这种家庭教育下，陆法言从小就敏学有家风，为他以后的编写《切韵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”

周德清始创北音韵书《中原音韵》，贡献很大。他写的《中原音韵》，对传统韵书大加革新，由于所谓不是正途出身的文人学士，反受到攻击，《元史》无传。作者根据高安县志以及周氏暇堂宗谱等材料，对他的生平作了较形象的描述：“他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六世孙，其曾祖父周京始迁高安暇堂，他精通音律，善作词曲，为时人称赞，一辈子没做过官。他一生颇好交游，从他传下来的诗文中可以知道他曾盘桓于庐山、浔阳、大都、吉安等地。他嗜酒、爱茶、好美食。常与友人歌妓一同欢宴、品茗、作曲、吟唱，尽兴时则‘客醉，予醉，笔亦大醉，他说自己‘诗酒疏狂’，可见其生活态度豪放。他追求的是清高的

生活格调，曾说：“舍梅花谁是交游，饮松醪自想期俦。”他还有强烈的正义感，在他的词曲中对岳飞韩世忠这些爱国英雄极力讴歌，而对秦桧、张俊这类误国贼则痛加唾骂。”

总之，中国古代语言学家，有的史书上无传，有的虽史书上有传但很简略，我们是下功夫，努力检阅较多资料。为其立传的。

二

在编写本书时，我们还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，并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文化背景来看语言学家及其著作。

例如，对荀子，作者写道：“先秦时期，语言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荀子也不是语言学家。不过，他具有进步的唯物的观点，在阐述认识论等哲学思想时，对语言学理论，如语言的社会本质，语言与思维，语言的发展等问题，有卓越的见解，即使今天看来，也很精辟，有启发。”作者又指出，荀子对语言学理论，有卓越的见解，这和他的生活实践有关，“荀子的一生活动范围很广，走遍了当时各国。他曾经南到楚国，北到燕国，燕楚相去不下三千里；又曾东到齐鲁，西到秦陇，齐秦相距也约三千里。荀子虽是赵国人，在齐楚两国居住较久，由于社会实践，使他对汉语的各地语言具有丰富的知识。”所以，在荀子的著作中，反映了他在语言学理论方面一些卓越的、科学的思想认识。文中还指出，早在先秦时代，荀子对语言的社会本质能提出科学的理解，这是和当时各家展开“名”“实”之争有关的。

史游《急就篇》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、最古最完整的一本字书，作者没有就史游《急就篇》而谈史游《急就篇》，而是仅把史游《急就篇》放在秦汉时期重视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，以及汉代有关语文规范的奖惩政策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来写的。

又如守温首创三十字母，作者指出我国古代汉语音韵学的发生和发展，是与从东汉末至魏晋隋唐时代的印度佛教的大量传入有关。由于佛经翻译，印度梵文的拼音原理也随之为汉人所掌握。守温所以创字母三十，作者写道：“公元七世纪中叶，¹藏族学者端英三布札从印度学成归来，参照梵文字母而创制了藏文三十字母，这一事件对于汉人的影响尤为巨大。守温必定是在类聚反切上字的基础上，参照了梵文和藏文，对于梵文和藏文中所具有而反切上字中所无的声母，自然不能妄事增加，而对于梵文和藏文中所无而反切上字确有分别的声母，由于梵文和藏文中无可比拟，因而也就付之阙如，终于造成了三十字母。”

三

作为一部历代语言学家的《评传》，自然应该注重它的学术性。参照本书撰稿的作者大多对所写的语言学家研究有素。这就为保证《评传》的质量创造了一定的条件。无论是辨误文字，还是校对版本，都力求观点稳妥、资料翔实，并注意吸取历代的研究成果。

如许慎，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语言学家，历代研究许慎及其《说文解字》一书者甚众，尤其到了清儒，《说文》研究四大家等，研究成果是很大的。因此，为许慎写评传，材料固然丰富，但如何能写出新水平，却很不容易。作者对许慎《说文》有较深学习和研究，又运用考古学的成就，联系古文字学，难得的是能运用理论观点进行分析，写出了新意。

在评述《说文解字》的文字学成就一节文中，作者首先评述了《说文》的文字起源发展史理论。他说：“作为中国文化如此重要特征之一的汉字，如何起源萌芽，如何发展演变，《说文》之前的先秦两汉典籍中，只有一些零星传说和记载。《说文·序》

首次综合论述了汉字从起源萌芽到东汉之前的历史发展过程。这是许慎对中国文字学一个杰出的理论贡献。”文中指出，根据《说文·序》认识到许慎的文字史系统可以分为“传说时期”和“历史时期”，即两时期九阶段，“从今天的古文字学、考古学成就来看，有合理内核”。“庖牺、神农、黄帝，可以说代表上古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，许慎把文字起源的步伐同他们相配，把文字的萌芽出现视为人类历史进化的产物，这种历史观点值得肯定。”

其次，许慎的“六书”系统，历来研究者甚多，或以为是造字之法、或以是析字之法。作者能从今天语言学理论认识加以分析评述：“许慎对于‘六书’的最大贡献是理论与文字实际的统一。许慎之前有两种情况，或是只提出文字的构造现象，不上升到模式理论，如《左传》的‘止戈为武’，《韩非子》的‘自环为私，背私为公’等；或是只有模式名称，没有文字实例，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‘象形，象事，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。’郑玄注《周礼》引郑众说有‘象形，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。’但没有界说、例字。”本文作者进一步指出，《说文·序》则有：

一曰指事，指事者视而可识，察而可见，上下是也；二曰象形，象形者画成其物，随体诘诎，日月是也；三曰形声，形声者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；……”

这是名称、定义、例字的统一体。不仅如此，许慎对《说文》九千多正文，说明了其模式所属，如“从某从某”为会意，“从某，某声”，为形声等。

作者又从语言学理论和考古实际，对许慎的“六书”加以分析：“六书理论的意义在于，世界上的文字大抵只有两个类型，一是纯表音拼音式的，一是兼有以形见义的即汉字式的。六书系统地描述出后一类型的形成方法。考古材料表明，许慎把‘六书’

分析为汉字形成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层次是正确的。”并特别指出形声构字法，兼顾了一般文字的表音要求，又兼顾了汉字以形见义的特点，所以发展十分迅速，从两周到《说文》成书前正是形声字大量生成时期，据本文作者抽样统计，两周时期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五十六，东汉时已高达百分之八十一，占压倒优势。许慎说：“形声相益即为之字，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”正是指这种情况。

又如段玉裁，是清儒大家，在古音学、训诂学等方面均有很大贡献。作者对段玉裁的学术成就有较深的体会，文中能将段氏古音学、训诂学联系起来评述。在“段玉裁在训诂学上的卓越建树”一节中写道：“在训诂学研究上，段玉裁从理论到方法都作出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提高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。”文中列举了三点：其一为段玉裁强调音韵学对于文字学和训诂学的重要意义，强调必须采取以音韵通文字，以音韵通训诂的方法。其二为段玉裁采取了“以字考经，以经考字”的基本方法。联系段氏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《说文解字注》，曾言：“昔东原师之言：仆之学，不外以经考字，以字考经。余之注《说文解字》也，盖窃取此二语而已。”（见陈奂《说文解字注跋》）其三为段玉裁已经有了字义发展的目光，能够明确地区分字的本义、引申义以及假借义的不同。从以上三点中作者得出：“以音韵通训诂乃是段氏训诂学理论和方法的核心部分”的结论颇有说服力。

四

本书在编写时，既对每个语言学家的著作有较全面的介绍，对代表作品有重点论述，也注意到对其生平经历有较为详细的评述，不是单一的看待一位语言学家，而是努力争取能多侧面反映，使其多姿多采。如顾野王，他是南朝梁陈之间文字训诂学

家。在语言学方面代表作为《玉篇》三十卷。作者除对《玉篇》详加评述以外，对顾野王生平有以下描述：“顾氏幼年十分好学，七岁读五经。即知大意，九岁能作文，曾作《日赋》一篇，为世人称奇。长而博观经史著作，凡天文地理、蓍龟占候、虫篆奇字，无所不通。……顾氏又善绘画，梁宣城王为扬州刺史时，于东府起斋，令顾野王画古贤象，王褒书赞词，同人称为二强。侯景之乱暴发，顾野王在家招募义军，奋起援救都城健康。他身体清瘦羸弱，但披甲上阵，慷慨激昂，见者无不壮之。”一般我们只知道有个编撰《玉篇》的学者顾野王，从评传中得知“披甲上阵，慷慨激昂”的顾野王了。

颜师古，唐代训诂学家。作《汉书注》、《急就章注》及《匡谬正俗》等，考证文字，多所订正，千百年来传世不衰、为历代小学家和史学家所推崇。如《急就篇注》，师古乃继承父、祖遗志。师古祖父颜之推曾为《急就篇》作注一卷，已亡；其父也欲注释《急就篇》以贻后学，但雅志未申即已长逝。师古在《急就篇》上下了极大功力，系统整理，精心作注，使之成为训诂学上一部名著，完整传世。

与此同时，作者写道：师古少年时博学，才华横溢。“隋仁寿元年（公元601年），尚书左丞李纲十分赏识师古，荐举他步入仕途，授安养（今湖北樊城）尉。尚书左仆射杨素见他年少体弱，担心他难以胜任，师古却成竹在胸，对曰：“杀鸡焉用牛刀。”杨素颇惊其人小言大。到任后，师古施展才华，将一县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，由此名闻遐迩。”这就可以看到颜师古多方面的才华。

潘耒，清代语言学家，代表作为《类音》八卷。此书参酌古今南北之音，增“三十六字母”为五十字母，又变更宋元等韵图分等之法，而以唇的形状为标准，分韵母为开口、齐齿、合口、撮口四呼。此书审音细密，为等韵学中有创见的著作。评传中写

他天资聪颖，“生而奇慧，读书十行并下”有“圣童”称号。潘耒幼时从其兄潘柽章学习，柽章为顾炎武挚友，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学家。清康熙二年，“湖州庄氏明史案”发，其兄柽章株连被斩，妻沈氏和二子被流放塞北。潘耒护送嫂侄前往塞北。潘耒为人很重师生、手足情谊。他曾筹款赎还其兄在塞外的两孤儿，并为其亡兄刻印《国史考异》等著作；又替老师徐枋刻《居易堂集》，为顾炎武刻《亭林遗书》及《日知录》等。潘耒遍游天下名山大川，接触了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和方言俗语，这对他的音韵研究是大有帮助的。

戴震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大学者，评传中记叙他少年时代的一段故事：“震十岁就傅，受《大学章句》，至‘右经一章’以下，问其塾师曰：‘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？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？’师应之曰：‘此朱文公说。’即问：‘朱文公何时人？’曰‘宋朝人。’‘孔子、曾子何时人？’曰：‘周朝人。’‘周朝、宋朝相去几何时矣？’曰：‘凡二千年矣。’‘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？’师无以应。”这一段记载，说明了戴震自少年时代，就具有独立思考精神，后来成为学术界领袖，并非偶然，敏学好思之故。

清儒桂馥，一般我们只知道他是《说文》四大家之首，有《说文义证》可与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比美。评传却写出了桂氏多才多艺的另一方面。桂氏少时即笃嗜古铜印，凡南北收藏，不远千里而求之，仿《汉隶字原》依广韵次第作《缪篆分韵》。缪篆即“摹印”，秦书八体之一，用于印玺。陈澧评曰：“收罗极博，考据极其精”。又《学晚集》八卷，为桂氏文集。从其《惜才论》文中，^①可见桂氏为人和治学态度，“凡人胸中不可无主，有主则客有所归。”又在《与友人书》中说：“有名满海内，叩之空空者，有名不出里巷，而敦实精核者。”表现了他不求空名，在治学上敦实的学风。如《说文义证》即为其四十年精心之

作。后人评论桂、段曰：“段氏之书，声义兼明，而尤邃乎声。桂氏之书声亦兼及，而尤博于义。段氏钩索比傅，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，勇于自信，欲以自成一家之言，故破字创义为多。桂氏敷佐许说，发挥旁通，令学者引申贯注，自得其义之拨归。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，桂书繁而寻省易了。夫语其得于心，则段胜矣；语其便于人，则段或未之先也。”《张之洞《说文解字义证序》》又桂氏有剧作《后四声猿》，其中有杂剧四种：《放杨柳》、《题园壁》、《渴府帅》和《投箇中》皆为一析。四剧分别取材于白居易、陆游、苏轼和李贺故事，题材美妙。桂氏时已年高七十，但遣词达意缠绵悱恻。近代学者郑振铎有高度评价。

五

我们通过这部评传，力求窥探到中国古代语言学家为人、治学等方面的优良作风。归结起来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其一，他们善于继承发展。如西汉时代的扬雄，他是个优秀的词赋家，也是个伟大的语言学家。他研究方言，吸收了前人成果，但主要是自己的创造，他坚持调查方言二十七年，写出《方言》是我国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，体例仿《尔雅》，又别开途径。他从当时的语言实际出发，分析观察，能作层次分析，分析出方言、通语、古今语，又能举出各方言区域，成为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杰出的汉语方言学家。又如东汉时代的许慎，他的《说文解字》也是在前人字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写成的。在秦汉时代，有《仓颉篇》等不少字书，许慎他善于继承前人成果，但是，他有进一步创造。他不是像其他字书那样，用韵语把许多汉字堆放在一起，而是科学地分析汉字的构造，把许多汉字按照形体的构造来分类，凡形旁相同的类聚在一起，立下部首，部首又按照篆书形体相近与否来编排先后次序。这样就把纷繁复杂的汉字，

编排组织起来。这种方法是前所未有的，乃是许慎的创造。又如陆法言《切韵》，也是继承前人韵书集大成的。我国古代韵书大量兴起，一为审音，一为作文。六朝时代韵书大量“锋出”，魏有李登《声类》、晋有吕忱《字林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韵书有多种。隋开皇初，陆法言年才弱冠，与刘臻、萧该、颜之推等讨论音韵，评论古今是非，南北通塞，又讨论研究了诸家韵书的得失。后来，陆法言编成《切韵》。自《切韵》一书出，六朝诸家韵书渐亡。唐宋时代的韵书，多以《切韵》为准。

其二，中国古代语言学家，具有开拓创新精神。如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，乃北音韵书的创始。隋唐时代《切韵》已经和当时的实际语音不全相合，而宋代《广韵》等韵书，又是沿袭《切韵》而来。因此，自金代韩道昭《五音集韵》开始对正统韵书进行改革。不过，这些改革只是局部的修改。直到周德清，他勇于革新、开拓，能以当时的活语言为研究对象，记叙反映了元代北方话的语音实际，才对传统的韵书进行了彻底的革新，开创了北音韵书。清儒在钱大昕以前，研究古音的，如陈第、顾炎武、江永、戴震、段玉裁等，都只注意古韵部的研究。首先注意研究古声母的，当推钱大昕。钱氏的古声母研究成果，主要有两点：一为提出古无轻唇音。这是钱大昕的创见，已为学术界所公认。二为提出古无舌上音。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五有《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》一条，专论古代舌上音与舌头音不分。钱氏所以能有如此卓越的二大发现，是和他对字母的看法有关，他的思想比较开拓，他认为：“古人因双声叠韵而制翻切，以两字切一音；上一字必同声，下一字也必同韵。……今于同声之中偶举一字以为例，而尊之为母，……”他认为所列举的“字母”，不过是同声之中偶举一字以为例。这种不拘泥而富有开拓精神的思想认识，促使他能大胆提出古无轻唇音、古无舌上音这样两大驰名的创见。中国古代语言学，主要是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三个方面；而对

语法研究，是从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正式开始的。马氏曾留学法国，“小学”根底很好，又通拉丁语和法语，受了西洋语法学的启发，著《马氏文通》，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学著作，对中国语言学史，在语法学研究方面，作出了开创性的杰出贡献。¹《文通》的影响很大，可以说，对于语法学的科学认识是从1898年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的出版之后开始的，并开拓了后来研究汉语语法学的风气。

其三，从评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语言学家治学态度的谨严。中国古代优秀的语言学家，他们的主要代表作，往往是他们花了毕生精力的精心之作。如清代邵晋涵《尔雅正义》二十卷，是清代第一个对《尔雅》作新疏的著作。这部书先群为增校，又博采前人注疏，前后经过十年，三、四易稿乃定。²学术界评价颇高：“邵二云学士作《尔雅正义》，……然后郭注未详，未闻之说，皆可疏通证明。”从此，研究《尔雅》之学者，则“多舍邢而从邵”。继邵晋涵之后，郝懿行著《尔雅义疏》十九卷，三十七万余字，是他毕生精力的著作。邵氏《尔雅正义》是佳作，郝氏《尔雅义疏》晚出四十年，他将二书进行比较，突出“据目验考释名物”的优点，又用力最久，数易其稿，终于使《尔雅义疏》成为另一部佳作。桂馥研究《说文》“四十年间，日取许氏《说文》与诸经之义相疏证，为《说文义证》五十卷。³刀穷根底，为一生精力所在。”清儒治《说文》者甚众，⁴已有桂馥、段玉裁二大家在前。但王筠治《说文》文学垂三十年，写成《说文释例》二十卷、《说文句读》三十卷。《清史稿》评他是“其书独辟门径、折衷一是，不妨傍于人。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，桂、段之劲敌。”

其四，从评传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的学风较为开明。在清儒中，江有诰是后起之秀。在经学上，他不及戴东原、段玉裁等大师；然而在古韵方面，江有诰确有很深的研究，

深受段玉裁、王念孙等的器重。江有诰以所著书《诗经韵读》请段玉裁作序，段氏在《序》文中说：“余谛观其书，精深邃密，盖余与顾氏孔氏皆一于考古，江氏戴氏则兼以审音，而晋三于二者尤深造自得。……于前人之说，皆择善而从，无所偏徇，又精于呼等字母之学，不惟古音大明，亦且使今韵分为二百六部者得其剖析之故。”段玉裁如此器重江有诰，而江氏虽为后学，他在写给段氏信中，一方面敬佩段氏的学问，另一方面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。他在信中说：“还淳方氏有言：‘学者当为宋儒净臣，不当为宋儒佞臣’，有诰敢为先生净臣，而献其疑焉。”……当时，段玉裁是大师，江有诰是后辈，在古音研究问题上，江有诰能独立思考，提出不同的意见，段玉裁不以为悟，反而大为赞赏，可见当时学术界学风之佳也。王念孙也十分器重江有诰。从段、王、江三人通信讨论学术问题中，反映了当时学风的开明。

本书虽各自谋篇，但却也相互呼应。在编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，内容方面也有呼应处。如前有史游《急就篇》，后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可明继承、发展。但中国古代语言学家甚多，基于想历代均能有代表者，又限于篇幅不能过大，因此，如清代有的语言学家，未能入选。将来，若有条件，当再写续篇。总之，中国古代语言学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份宝贵遗产，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，是期望有更多人能向他们学习，并弘扬他们孜孜不倦地发展祖国语言学事业的可贵精神。

1988年6月于复旦大学